

立法會需要一場道德回歸運動

深度
評論

徐若曦

日前，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接受採訪表示，希望全體議員留任繼續幫市民做事，以確保議會中能維持足夠多元的聲音，還對現屆議員四年任滿酬金、議員延任酬金等問題作出明確答覆。梁君彥也透過媒體特別提醒議員，在未來一年應按立法會議事規則辦事。不過，這番「溫馨提示」對攬炒派議員能否起作用、攬炒派議員會否領情，令人懷疑。

回望第六屆立法會四年任期，禮崩樂壞，創下了不少特區立法會成立以來不光彩的「首次」紀錄：首次有議員宣誓時侮辱國家和特別行政區被DQ，首次有議員長期拖欠立法會薪酬津貼不還被申請破產，首次有議員在一屆任期內被趕出立法會會場近百次，立法會首次被暴徒佔領並遭受大肆破壞……這些全都可以記在攬炒派議員的「功勞簿」上。

在其位，謀其政，議員在立法會的使命是在制度空間內表達政治訴求，並為各種訴求尋求理性的解決方案，但攬炒派議員道貌岸然，以最高道德標準「監察」政府，卻以最低道德標準要求自己，以極端化和撒潑粗野的方式行事，褻瀆了議事堂的莊嚴，辜負了選民的信任，已從道德高地墜落下來，節操碎滿地。

沒有對比就沒有傷害。攬炒派議員有多麼猖獗，從同樣的議員違法違規行為，在香港立法會和西方國家議會不同的處理結果，可以看得更清楚。

攬炒派議員違背政治倫理，對特首惡語相加，得到應有懲罰了嗎？去年10月林鄭月娥在立法會準備宣讀施政報告，竟然有攬炒派議員詛咒特首「幾時去死」，只是被趕出會場了事。而在美國，2009年

眾議員威爾遜因對時任總統奧巴馬大喊「你撒謊」，而受到眾議院譴責；今年2月美國總統特朗普在國會發表國情咨文時，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將手中的咨文副本撕成兩半，白宮隨後對其予以譴責，共和黨議員也向眾議院道德委員會提出道德指控。

攬炒派議員貪得無厭，連欠賬還錢的基本道德都不顧，得到應有懲罰了嗎？梁頌恆拖欠立會93萬薪金不還，行管會追討四年未果，最終只能要求法院申請其破產；朱凱迪、許智峯拒絕交納污損立會的數萬元清潔費，行管會只得從其未發還工作開支中扣除。而在美國，2010年眾議院道德委員會指控資深議員蘭格爾犯有偷稅漏稅等多項過失，眾議院通過不信任投票對其道德違規行為予以懲罰；在英國，2019年下議院議員戴維斯因做700元英鎊的假賬被揭發，經選民聯署直接罷免議員資格。

攬炒派議員參與非法活動官司纏身，得到應有懲罰了嗎？陳淑莊、邵家臻因參與非法「佔中」被判監8個月（陳淑莊緩刑2年），建制派議員提出解除二人議員職務的動議遭否決，二人議席得以保留。而在英國，2019年工黨女議員歐珊娜因超速罰單一事欺騙警察，獲刑1個月，議會根據議員罷免法，經選民聯署解除其議員職務。

修改議規降低罷免門檻

西方議員出於選舉政治的需要以及黨派和自身利益，同樣把職業光環作為實現政治目的之工具，但因議會法律完備，制度規矩執行嚴格，議員違法行為才得到有效制約。香港攬炒派議員之所以為所欲為，很重要的原因是政府太過君子，立法會議事

規則太過君子，制度的執行也太過君子了！當君子遇上小人，政府還要再做以德報怨的聖人嗎？林卓廷近日已高調表態稱，如果延任會繼續推動「議會抗爭」，並與「街頭抗爭」裏應外合。政府必須放棄幻想，考慮採取「法治」和「德治」相結合方式，促使攬炒派議員回頭是岸、立法會重返正軌。

為此，建議仿效上世紀90年代英國首相馬卓安應對議員「現金換質詢」醜聞事件發起的「道德回歸運動」，開展一場「立法會道德回歸運動」。

一是修改立法會議事規則。2015年英國議會制定首部《議員罷免法》，若議員犯罪、因不良行為遭暫停職務或報賬造假，選民聯署就能對其提起罷免請願，只要6周內有10%選民簽署請願書，就能剝奪席次。建議參照上述法律規定，相應修改和細化立法會議事規則有關取消議員資格的條件，降低罷免門檻。

二是成立立法會「道德委員會」。借鑒美國參眾兩院道德委員會和英國議會公共生活準則委員會經驗，將立法會「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改為「道德委員會」，賦予其制定議員行為準則和監督、處理議員違紀行為的職權，對違規議員起到警示作用。

三是加大運用現行法例懲戒違法議員的力度。香港國安法已明確規定癱瘓政府運作是危害國家罪行，為懲戒違法議員提供了新的法律武器；今年年中高等法院上訴庭已裁定議員在立法會內的破壞行為也須受《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制約，攬炒派議員日後再有此類行為，可依據《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第17條藐視罪加以制裁。

資深評論員

國家制度是香港穩定發展的基石



知微篇
周八駿

關於香港特區政治體制是否「三權分立」的爭論，是理論問題和法律問題，更是政治問題。即使在理論上和法律上澄清了特區不實行「三權分立」，但是，只要美英對香港的心不死，其代理人「拒中抗共」政治勢力人還在，那麼，「三權分立」的老調仍將沉渣泛起。因為，這是美英及其代理人爭取香港脫離中國的一種政治口號和思想誘導。這種政治口號和思想誘導之所以在香港有一定市場，是由於特區至今沒有確立關於國家制度的正確認識，甚至連建制派某些人，至今仍以為香港的制度優於國家的制度。他們理解的「一國兩制」是強調香港這一制，忽視甚至無視國家制度。因此，建議特區政府把最近關於特區政治體制的爭論，引向關於正確看待國家制度的討論甚至爭論。

這樣的討論和爭論具有現實意義。第一，有助於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看清香港在防抗新冠肺炎疫情中所暴露的制度缺陷。毋須諱言，香港尚未建立有效防抗疫情常態化的體制機制。普檢計劃固然能讓特區政府掌握相當數量的香港居民是否感染病毒的信息，但是，距百分之百地掌握疫情、進而百分之百地阻斷疫情擴散，差距仍然顯著。

常態化防抗疫情以保持經濟和社會正常運轉所要求的，不是也不可能是每天零確診病例，而是把每天確診病例控制在低水平，同時，一旦出

現疫情反彈能夠立即找到源頭、隔離感染者、切斷傳播鏈。毋庸贅言，不實施全民強制性檢測，或者不在疫情局部反彈地區實施「禁足」加上強制性檢測，香港不可能建立有效防抗疫情的機制，經濟和社會也就無法恢復正常運轉。

至今，政府無論收緊抑或放鬆社交限制以及對若干公共場所和私人服務的限制，都是以周（7日）計，如此短期舉措，豈能讓香港居民和企業產生安定感？與內地比較，特區政府和香港居民必須承認，香港現行制度，缺乏國家制度所擁有的集中力量辦大事、辦難事、辦急事的能力。

第二，確立關於國家制度的正確認識，有助於香港居民認識西方國家制度的缺失。長期以來，香港居民對於香港制度的優越感，與他們對西方國家制度的崇拜相聯繫。進入新世紀以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已顯示西方國家制度普遍陷入空前危機。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加快西方國家制度衰落。

為應對疫情，西方國家紛紛擴張政府權力，限制個人自由以維護國家集體利益。西方很多評論家認為，新冠肺炎疫情正在給過去40年盛行的新自由主義的棺木釘上最後一枚釘子。過去40年

，西方國家普遍以市場的優越效率為名，追求資本短期利潤極大化，許多國家政府的治理能力被掏空，行政官僚體系效率全面下降，社會貧富差距日益懸殊。尤其，當前，西方國家應對經濟衰退乏力。最新統計數據顯示，在主要經濟體中，唯中國經濟已恢復增長，西方主要經濟體集體向蕭條跌去。

香港仍然有自己的一些優勢，但是相對以往、比較內地，優勢在減弱。即使法治，也由於司法體系缺乏與時俱進而有所褪色。

總之，面對現實，特區政府和香港各界必須全面客觀地重新認識香港的制度和西方國家的制度，全面客觀地確立對於國家制度的應有認識。

美國政府已把對中國實施「新冷戰」的矛頭直指中國共產黨，欲組建反中共國際聯盟。在這樣的背景下，香港必須確立堅定支持和接受國家執政黨領導的社會共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根本特徵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一國兩制」的「一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拒中抗共」政治團體表示接受「一國兩制」，卻主張「結束一黨專政」，注定他們不可能真正擁護「一國兩制」，而是必定阻撓和破壞「一國兩制」。是時候了，香港社會必須摒棄「結束一黨專政」的政治主張，當然，也必須一同摒棄企圖在香港複製西方制度的「真普選」主張。

資深評論員、博士

西方國家真心為港？



教育茶餐廳
何漢權

遇有學生、校友、老師參與學界的聚會，

筆者常常抓緊機會，在與會者面前自問自答：「全世界最真誠地對香港的國家是誰？」「當然是咱們的國家，即中國」，歷史如山，鐵證多得很！

港英時期至今，作為香港食水最主要來源的東江水從哪裏來？港人日常的主要糧食和副食品，絕大部分是內地生產製造；回歸以後，香港特區的財政收入不但毋須上繳中央政府，反而因為「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帶來種種機遇，中央政府更時刻關顧香港，2003年內地開放「自由行」，幫助香港在沙土之後經濟復甦；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爆發，中央政府在內地全力抗疫的同時，不忘香港，提供大量抗疫物資，亦派遣近600人組成的核酸檢測支援隊來港，協助特區政府展開「普及社區檢測計劃」。這是血濃於水，是情義在心間！

然而，香港一些用盡心思計謀，高舉親美愛英媚日旗幟的大、小政客及其團夥，由始至終對中央、對特區政府都採取事事否定的取態，肆意造謠詆毀普檢計劃。那些親美愛英媚日的政客請捫心自問，香港遭遇前後三波新冠肺炎疫情，英美等「民主國家」幫助過香港些什麼呢？錢財嗎？專家嗎？抗疫物資嗎？全都沒有，有的只是出盡諸多政治的口術、政治欺壓，無時無刻都提出要制裁香港、並封殺中國。除此以外，還有其他嗎？

前事不忘，一百二十年前的庚子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戰敗的清朝、中華大地的老百姓都要背負戰敗的恥辱，4億5千萬中國人民，每人都得懲罰，罰款就是4億5千萬兩白銀，連本息是9億8千萬兩白銀。今天恐懼中國崛起的美國，當年分得3200萬兩白銀，1908年退款中國時，指定該退款用作資助大學生赴美留學，或用作興辦高等教育機構。一直以來，美國都引此自豪，說這是政治賠款用作非政治學術用途，堪稱美善，一些夢裏只有美國的尊貴學者，同樣不忘點讚，但實情如是嗎？

1906年，美國伊利諾大學校長詹姆士在給狄奧多·羅斯福總統（老羅斯福）的一份備忘錄中，有言：「哪一個國家能夠做到教育這一代中國年輕人，哪一個國家就能由於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業上的影響取回最大的收穫！」

今日看當年，政治干預美國是老祖宗了，庚子賠款到美國留學，留學生將以不同的方式效忠美國，文化親美，利益歸美，「親美」兩字的意涵極廣大，中國的任何輸利，美國是一體均沾的了！事實上，到1930年代，美國已超過日本，成為中國留學生最多的國家，直至今天都如是，當今，最懂得政治洗腦之術，美國當之無愧！

「三權分立」論實為「抗中奪權」論



青評後浪
梁辛發

近日有通識教科書刪除香港實行「三權分立」政體的內容，在社會上引起討論，雖然香港在回歸前後從未實行「三權分立」是人所共知，但攬炒派不斷挑動政爭，試圖將立法和司法機關凌駕在特區政府之上，阻礙政府施政和運作，可謂居心叵測。

眾所周知，香港一直都是實行「行政主導」而非「三權分立」。即使是攬炒派盲目崇拜的西方國家，也不是完全照搬「三權分立」的一套。美國只是較為接近「三權分立」的「總統制」；而英國所實行的卻是「議會至上」而非「三權分立」，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實際上相互重疊，彼此更多是合作而非互相制衡。

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特別行政區，其權力來自中央政府授權，香港的行政、立法和司法必然服膺於中央主權，行政長官由中央任命，並向中央人民政府負責，因此不會亦不可能搞「三權分立」。

攬炒派郭榮堅早前宣稱「三權分立」是普通法背後的重要憲制原則，卻完全無視同樣實行普通法的英國正正是實行「三權分立」；大律師公會則是肆意歪曲基本法，難怪早前終審法院前常任法官劉顯倫在報章撰文問大律師公會是否不接受香港主權已在1997年回歸祖國時，公會煞有介事回應稱並非不接受香港已回歸，但其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香港沒有「三權分立」是鐵一般的事實，特首林鄭月娥、《兩辦》先後發表聲明嚴正指出有關謬說，攬炒派仍繼續唯恐天下不亂，多次試圖挑戰中央對香港特區的全面管治權，妄圖破壞中央和特區之間的關係。攬炒派不斷將立法機關和司法當作意識形態鬥爭的武器，各界必須合力撥亂反正，使香港社會盡快重回正軌。

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成員

美疫情乃人禍 新書為中國「洗冤」

中美
關係

顧鏞墨

美國總統選舉白熱化，民主黨候選人拜登民調雖然稍高，但在關鍵州和特朗普差距不大，任何突發事件都可能影響選情。這時，《華盛頓郵報》著名白宮記者伍德沃德即將出版的新書《憤怒》（Rage），就因部分章節率先披露而觸動選情。

據《華郵》發放的採訪錄音，特朗普坦承今年2月初和國家主席習近平通電話時，習主席告訴他新冠病毒可在空氣中傳播，比那些只能通過觸摸傳播的病毒的危險性要大得多。特朗普又坦承，自己故意淡化疫情威脅。特朗普自己對此解釋是「自己是這個國家的啦啦隊長」「不希望人們受到驚嚇」。

美國是現在全球疫情最嚴重的國家，六百萬萬人感染，接近二十萬人死亡，感染人數遠以每天幾萬人的速度上升。受疫情影響，第二季GDP按年度計大跌將近三分之一。直逼1929年經濟危機的記錄。

目前，美國雖然在力推「復工」，但復工復課之後疫情上升，又令很多機構不得不重新關閉。不要說恢復原先的正常生活在短時期內無法做到，就算能否按「新常態」生活也成疑。美國作為全球綜合實力第一大國，本應「領導全球抗疫」，卻變成倒數第一。

美國不是沒有科技能力。恰恰相反，美國有全球最強的醫院、醫學院、生物科技科研機構和製藥公司，也有久負盛名的公共衛生專家和流行病學專家。世界很多國家大專院校的流行病學和公共衛生課程選用美國專家編寫的教程。

美國也並不缺乏用新型的信息科技輔助對抗疫情的科技，「健康碼」之類的追蹤監察系統，美國都有條件在短時期內開發出來，可讓國民推廣使用。

美國也並非沒有對抗呼吸類流行病疫症的經驗。美國每年都開發流感疫苗，收治流感病人。

美國人民這麼慘，原因當然有不少，但最首要的責任人就是這個「特不靠譜」的特朗普政府。綜觀半年有多多的疫情，特朗普政府從來沒有把「抗疫」放在最首要的位置。

首先，特朗普明知病毒非常致命，在疫情早期卻一直淡化疫情，給公眾派定心丸。特朗普真的只叫「大家不用擔心」而已，在準備工夫上幾乎為零，把美中航線一封了事，以為萬事大吉。

「刻意瞞報」的正正是特朗普

其次，疫情開始蔓延，特朗普又把精力都放在指責中國上。新書的內容再一次批駁了「中國瞞報」的指控。原來，中國不但按國際慣例報告給世衛組織，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還專門打電話，直接向美國總統特朗普通報，還強調病毒「非常致命」，這難道是「刻意瞞報」嗎？

其實，中國固然是最少爆發疫情的國家，但美國疫情和中國的沒有多少直接關係。美國最早的「震央」紐約，其傳播源頭主要來自歐洲。從中國爆發疫情到美國在三月爆發疫情之間，至少存在幾個關鍵節點，只要抓住一個機會做好準備，足以讓美國躲過災難。

如果特朗普政府態度認真，準備充分，即便美

國有零星病例，也完全可以通過追蹤隔離等方式，從源頭撲滅。疫情根本不會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第三，美國疫情在三月爆發一發不可收拾，但就算嚴重至此，特朗普政府照樣把政治鬥爭放在管控疫情之上。

特朗普掀起聯邦和各州之間的罵戰，把疫情控制不利怪責在「民主黨掌權的州」上。當全球各地都意識到戴口罩對防疫非常重要時，特朗普為了黨派政治和維護「強人形象」，堅持不戴口罩，不負責任地給國民一個壞榜樣。他一面說民主黨州控制不力，一面又批評民主黨州「封城」措施。在疫情尚在高峰之際，他急推「重新開放」，為此向各州施加壓力。本來為經濟考慮，重啟是不得不為的選擇，但「特朗普式的重開」沒有周密的措施為配套，只是一味要求重開，不顧策略，不顧各地現實，甚至不惜以不發放外國學生簽證的極端手段威脅要求大學復課。這完全是「為重開而重開」的盲動，結果各地在勉強重開後立即迎來第二波疫情高峰，從感染人數看比第一波還要迅猛。

特朗普這樣做完全為自己能否競選連任，把政治利益放在國家和人民利益之上。他淡化疫情，固然最大的原因是擔心「人們受到驚嚇」之後會影響經濟，影響股市，再影響自己的連任機會。再加上民粹主義的通病：排斥專業、排斥科學、認定專業人員都是與他作對的「深層國家」，如何能不導致糟糕透頂的防疫？

客觀而言，如果今年不是大選年，情況或許不會這麼糟糕。但再討論下去，就牽涉到更深層次的制度問題了。

旅美學者